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群众演唱

第十八辑

北京出版社



群众演唱 稿 约

(一) 我们欢迎下列稿件：

1. 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思想和斗争的通俗演唱作品，如小型话剧、歌剧、小型戏曲、相声、单弦、鼓词、快板、民歌、朗诵诗、评书等；

2. 优秀的民间传统演唱作品；

3. 指导群众创作和艺术表演的通俗理论文章；

4. 有关群众创作与文艺活动的短论、杂感，业余文艺活动的经验介绍和情况报导等。

(二) 来稿请用稿纸横写清楚，勿两面写，勿一稿两投，并注明作者姓名和详细通讯地址。

(三) 来稿如系经过加工、整理、改编的作品，请将原作或原始材料一并寄来。

(四) 来稿一经发表，即致送稿费；如不刊用，一律负责退回，但不一定提出具体意见。

(五) 我们对来稿得斟酌删改，如不願删改者，可注明。

(六) 来稿请寄北京崇内大街一八五号北京群众艺术馆“群众演唱”编辑部，并在信封上注明“稿件”，贴足邮票。稿件勿寄私人。

群众演唱（第十八辑）

北京群众艺术馆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北大街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2·字数：45,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0071·188 定价：(6)0.18元



陈永祥 設計

“几个青年人”舞台設計圖



— 目 录 —

檢查和改进我們的工作	本刊編輯部 (1)
評論		
辨“灶王爷”的毒質	常 澤 (5)
這是一支毒箭	李大千 (9)
“何處不相逢”是一株毒草	吳 源 (11)
幾個青年人(獨幕話劇)	孟 翎 (16)
曲艺与演唱		
陳老陽收破爛(小演唱)	邱自操 (38)
換假日(山东快書·胡佩求插圖)	周 珉 (45)
笑面虎催長工(山东快書)	王增群 (50)
王老漢的心事(二人轉·石碧如插圖)	邵昌仁 (54)
一脚踏到福地里(快板)	唐 华 (49)
新拴娃娃(書帽)	楊善元 (59)
詩与民歌		
丰收(外一首)	逸 群 (57)
洗衣裳(外一首)	杜三科 (58)
民間情歌	本生搜集整理 (61)
宜興民歌	惠雪琛搜集 (62)
北京業余話劇團成立了(通訊)	明 波 (64)
抄襲又一例	(15)
“幾個青年人”舞台設計圖	陳永祥(封3)

檢查和改进我們的工作

本刊編輯部

偉大的反右派鬥爭在各个戰線上的勝利，更堅定了我們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在文藝戰線上，我們更堅定地貫徹毛澤東的文藝方向和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道路。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說，通過這一次階級鬥爭，都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提高了覺悟，擦亮了眼睛。在這個基礎上，我們編輯部檢查了自己的工作。我們發現，“群眾演唱”在創辦以來將近兩年時間內，雖然在篇幅和數量上，反映新社會新人新事的作品占着多數，但是，真正有分量的、政治性和藝術性都較高的作品確是鳳毛麟角；而揭露新社會個別缺點的諷刺作品倒是不少，而且，其中有許多是毒草或含有毒素的作品。在這些作品里，有的歪曲了我們新社會的面貌，有的惡意地攻擊了領導干部，有的部分失實，或是過於夸張，失去了分寸。經我們編輯部初步檢查，認為是毒草或含有毒素的作品有下列各篇：相聲“緊急會議”（載第五輯，陳石之作），“灶王爷”（載第七輯，戴君原作、徐澄改編），“新天河配”（載第十輯，孫秀汶、馮不異、徐澄作），“聞過則氣”（載第十六輯，陳本志作），岔曲“有一位干部”（載第十四輯，馬全福作），話劇“何處不相逢”（載第十五輯，賈魯作），山東快書“高帽子”（載第十六輯，濶星作）。

在“緊急會議”里，作者把處長描寫成為無知、昏庸、糊里糊

塗的人物，同时，把處長以下的大小領導干部，一概都寫成是不動腦子的糊塗虫。这不能不說是对我們的國家機構和干部的严重歪曲和誣蔑。这篇相声到了編輯部以后，我們非但沒有發覺其錯誤所在，反而作了加工修改，更加渲染了歪曲現實的效果，增加了毒素。

相声“灶王爷”，它借用旧社会迷信偶像灶王爷的形象，来比喻今天的领导干部，这就是原則性的錯誤。作者又把这个別的缺点和錯誤，七拼八湊、牽強附會地集中起来，加之于灶王爷的身上，借此来攻击领导，态度是非善意的，效果是鼓动群众来拆领导的台。山东快書“高帽子”，也是借民間故事以古喻今，揭露我們社會上有許多人只是喜好奉承，不能接受批評。作者的态度是消極的暴露，提出的問題也不是新社會本質的反映。

在相声“新天河配”里，作者对某些领导关心群众生活不够，对夫妇分配兩地工作長期未加解决的現象归咎为对女同志的歧视，并且夸张到了荒謬的地步，以致歪曲了現實；同时，作者又过分渲染了夫妇分居兩地單独生活的淒苦景象，其后果只能引起人們对领导的不滿。

在話劇“何处不相逢”里出現的兩個人事科長对自己的爱人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当听到她被調成杂工时则大發雷霆，挺身而出，要去找另一人事科長說理；而对待其他女工，则明知故犯，違反国法党紀，假借組織名义，給对方施行压服。这个剧本的題材本身是不真实的，人物的形象是惡劣的，其客觀效果是歪曲了新社會的本質。在相声“聞過則氣”里的科長是：对下压制批評，打击报复，对上虛报成績，平时消極怠工。他为了堵塞下級的批評，故意曲解馬列主义經典著作，并誣指批評他的人是“反党、反人民”，而且还是一个長期坚持錯誤，不肯改正的人。在岔曲“有一位干部”里的干部，也是一个腐化墮落，对別人的批評准备施

以报复的坏分子。像这样品質恶劣、違法亂紀的坏人在我們的社会里虽然沒有完全絕迹，但他們的存在倒底是極其个别的，不合法的，我們的党和社会决不可能容忍他們長期窃居领导职位，坚决不改正錯誤的。而在上面这些作品里，作者却夸大地暴露了他們的面目，沒有同时展示出我們社会的主流和本質，好像这些人是可以明目張胆地为所欲为的，这就歪曲了今天的現實。

对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錯誤的作品，我們不在这里作全面的分析，我們只从政治思想上着眼，扼要地指出其錯誤所在。对于這些作品的評論，也不一定就是定論，这只是我們編輯部的一个共同看法。至于這些作品中所涉及的創作方法問題，諷刺的运用問題，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問題等等，我們已在本輯中有重点地撰寫了几篇較為詳尽的評論，这里不作更多的探討。

为什么我們能讓这許多有害的作品掠过我們的眼睛，送到讀者面前，讓它們散布不良的影响呢？这在我們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上是有其根源的。首先，我們对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理解不深不透，有片面性，認為要讓不同流派、不同風格的作品齐放，就不能因不合几个編輯人員的胃口而来判定作品的命运，要讓它們放，要拿到广大讀者当中去考驗，这就放松了作为編輯的職責。对于有些作品，当初編輯部虽有不同的看法，意識到作品的錯誤，但也不是从政治上着眼，而認為是創作方法上的不尽完美，或是不同的表現手法，是屬於艺术問題范畴的，既然是艺术問題，那就可以齐放。例如“灶王爷”、“何处不相逢”、“高帽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放出来的。編輯部在評定稿件的問題上，长期以来忽視了作为衡量作品的主要标准——政治标准，而是更多地偏重于艺术标准；又由于我們的政治思想水平低下，有脱离政治的倾向，对許多在政治上有着严重錯誤的作品，未能敏锐地觉察，清楚地辨别，这就使得这些作品有可能从我們的手中

滑过，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后果，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深感痛心的。

再者，我們对于文学艺术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任务的理解，也有片面性，也是错误的。我們错误地認為要干预生活就要敢于揭露社会上的缺点和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因此，我們特别留意报纸上每个时期所揭露和批评的一些个别缺点和错误，搜集这方面的材料，组织作者创作，認為这样才是反映了现实。在去年年底编辑部召开的一次作者座谈会上，我們也强调了希望作者多写以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作品，“新天河配”和“有一位干部”就是这样产生的。在我们的思想上，对揭露缺点和歌颂新人新事两者的位置显然是颠倒了，我們强调了文艺要去反映非本质的、个别的缺点，而忽视了去反映新社会本质的进步和光明的一面，这就使得我們的刊物上出现了较多的暴露性的作品，而相对地减弱了歌颂新社会的作品的分量。同时，对待暴露性的作品，我們也没有能够分清作者在批评我們新社会的缺点时所站的立场和所抱的态度是否正确，因此，讓实质上是誹謗和歪曲我們的党和新社会本质的有害作品得到了发表的机会。这说明我們的政治立场是不稳的，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文艺武器来巩固和建設我們的新社会，而是丧失了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攻击和损害了我們的党和人民的事業。尤其严重的是，在“鸣放”期间，我們还曾发出过“闻过则气”和“高帽子”这类有毒的作品，而当着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期间，我們的刊物竟然没有及时地配合，使刊物表现了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我們深深地感到我們失职的严重性，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有负于讀者的期望。今后，我們一定要努力改造思想，提高認識，加强责任感，尽全力做好工作。同时，我們还希望听到讀者的批评，帮助我們来鉴别香花、毒草，以期达到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质量的目的。

辨“灶王爷”的毒質

常 澈

戴君原作、徐澄改編的相声“灶王爷”是近年来在群众中流傳較广的一篇作品。它發表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出版的“群众演唱”第七輯中，“解放軍文艺”十月号予以轉載，同年又作为春节群众演唱材料而印了單行本。北京軍区战友文工团曾不断演出，天津市曲艺团也曾改編公演；在群众性的文娱晚会上，“灶王爷”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精采”节目。实际上，这段相声并不是鮮花，它以“尖銳地諷刺了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風”（見“群众演唱”第七輯內容介紹）为幌子大肆歪曲污蔑新社会，并恶毒地攻击了久經鍛煉的革命領導干部，徹头徹尾是一株毒草。既然它曾經流行一时，为害不淺，那么今天就大有必要来辨明毒質，并把它从相声园地中·連根鏟除！

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須真實地反映生活，通过对人物的刻划、事件的描写真实地反映出时代面貌。相声是一种諷刺艺术，一般总是以刻划反面人物見長，对生活中落后、腐朽的旧事物加以無情的嘲笑和鞭笞，使人更能認清其丑惡面貌，对之深痛惡絕，从而有助于新生事物、新道德品質的成長。这是相声艺术的特征。然而，相声艺术同样必須产生于生活的土壤中，即是說，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的夸张才算得諷刺。否則，就是無中生有与信口开河，那么，相声这个犀利的批評諷刺武器，恐怕要贬值为單純以逗人开心解悶为能事的玩艺了。在“灶王爷”这篇相声里，作者生拼硬凑地为“灶王爷”找了十大缺点，涉及到工作态度、道德品質、群众关系、生活作風等各个方面，是否符合生活真实呢？举例說：四体不勤，九点不起，尽貪圖享受，十足的資產阶级思想和生活

作風，这些难道还是官僚主义？飞黃騰達以后連父母妻子都不認了，嫌原来的愛人士里土气，打离婚了，另搞个漂亮的灶王奶奶，这又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显然，“灶王爷”不是具有生活气息、性格特征的人物，而是作者根据十大缺点牽强附会写出的一个容污藏垢的垃圾箱。我們並不否認新社會中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官僚主义，但是像作者筆下所描繪的这样腐化墮落、品質惡劣的分子在生活中确是难以寻覓的。更为严重的是，作者說“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报喜不报憂，虽沒有工作成績，报告起来却洋洋數万言；“下界”以后与职位不相上下的人是八面玲瓏，互不侵犯，互相吹捧，保持一团和气；对于群众，则是“一家之主”他說了算”——实行家長式的領導！这里，作者不仅进一步把領導干部汚蔑为夸夸其談、虛报成績、兩面三刀、陽奉陰違的人，同时把其他領導人也写成臭味相投的一丘之貉，而革命組織則被歪曲为“灶王爷”一手統治下的独立王国。固然，在实际生活中腐化墮落的和其他坏分子并非根本絕迹，但这种社会渣滓終究是極个别的，不合法的，进步光明的一面才是新社會的本質与占絕對优势的主流。作者無視这个铁的事实，而憑空捏造了十大罪狀來諷刺領導干部，这对新社會还不是最大的汚蔑嗎？姑且不談老干部在过去历次革命斗争中怎样前仆后繼出生入死，以最宝贵的生命和鮮血換来了人民的胜利果实，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他們絕大多数也是兢兢業業为人民服务，依然是各項事業中的核心領導力量。在“群众演唱”編輯部召开的專題討論会上，有人說：領導干部別說有“灶王爷”的十大罪狀，有那么一兩条就該撤职了。这是句老实話。某些领导同志有些官僚主义的缺点，但与“灶王爷”在性質、程度上有何共同之处呢？作者这种無中生有、置众恶于一身的写法不正是为某些謬論在客觀上作了形象化的說明嗎？我覺得，問題不仅在于这十大缺点是七拼八湊的，人物是毫不真實

的，問題還在于：在我們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法黨紀的約束和人民羣衆的監督都是根本杜絕“灶王爷”產生的有力保證。

“灶王爷”的題材是毫無生活依據的，我們進一步看一下作者對“官僚主義”的態度如何。毛主席早就指示過對敵、友、我進行批評應有不同的立場、態度和分寸。批評人民內部的缺點必須與人為善，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容否認，絕大部分共產黨員、革命干部都在勤懇地為人民服務，並非有意識地犯官僚主義的錯誤，有了過錯，經過組織教育和羣眾監督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可是作者一開始就宣布“灶王爷”過時啦，人們覺悟提高啦，思想進步啦，誰也不相信他那一套啦，從而斷言“灶王爷”要受到淘汰。很清楚，作者牽強附會地為他安排了十大缺點，然後又指出撤職反省是他的必然結局，這就是作者總的态度。看來，作者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實事求是地指出缺點，善意地幫助同志，還是捏造了莫須有的十大罪名，惡狠狠要把“官僚主義”一棍子打死，這不是清清楚楚嗎？必須指出，作品這種錯誤的政治傾向性決非偶然。因為貫串在整個作品中十大缺點是作者“經過觀察、思考、分析、研究、概括、集中、綜合、提煉才整理出來的”，而“灶王爷”被撤職反省則是經過“專門研究的結果”。可見，這篇作品的錯誤不是局部、個別的細節問題，而是作者在立場、觀點上一系列的根本錯誤。

下面再談一談“灶王爷”的藝術手法問題。過去，有人喝采說這種寫法是“含沙射影”，突破了一般公式化的框子；有人認為它所以受到歡迎“除內容新穎不俗以外，在寫作手法上巧妙地借用了灶王爷的形象不能不是重要的原因”（見“群眾演唱”第十六輯，方山：“談相聲創作的‘撞車’”）。看來，它的藝術手法確是很引人入勝的。其實，衡量一部藝術作品，內容與形式永遠不能割裂來看，二者不取得高度的結合就不能得到預期的藝術效果。退一步

說，即使單以它的藝術手法而論，也是荒唐無稽、錯誤百出，毫無值得推崇之處。我認為：“含沙射影”常常借助于寓言、神話等方式，是通過對另一件事物的描繪而隱喻地表現作者的真意，如“中山狼”的故事意在批判無原則的溫情，“画皮”的故事意在揭露危險的兩面手法等；而不是主張藝術上違反歷史地張冠李戴、今古不分——那樣只會引起藝術創造上的荒唐與混亂！當然，神話和含沙射影的手法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是不能為其他藝術形式所代替，也是不能加以排斥的。但是，作者運用這種手法來諷刺今天的官僚主義那就“風馬牛不相及了”。“灶王爷”是封建社會中的迷信偶像，與今天具有馬列主義世界觀的領導干部怎能混為一談？這種“含沙射影”本身就是荒唐、不倫不類的，有着原則性的錯誤。作者再從“灶王爷”的形象出發尋找噱頭，這就不可避免地脫離了真實的生活基礎，只能強拼硬湊地製造十大缺点，把人物寫成各種丑惡現象的堆積。應該說，不管作者先有了諷刺官僚主義的動機才選用的這種表現手法，還是根據“灶王爷”的形象來選擇的題材，其藝術效果都是同樣荒謬的。可能，有人會為之善心地進行辯解：“灶王爷”只是一個神話相聲，不必過多地聯繫政治原則吧！我們知道，“神話乃是自然現象，對自然鬥爭，以及社會生活在廣大的藝術概括中的反映。”（高爾基：“蘇聯的文學”）从来就不是不可理解的無稽之談。在階級社會里，藝術無法也不可能超階級、超政治，這是人所共知不可駁辯的事實。由於思想內容、整個構思有著根本政治錯誤，這種不倫不類的手法藝術性越“強”，也就越能顛倒黑白，越能巧妙地騙人惑眾，越能隱晦地傳播毒質！

最後，應該指出的是：“灶王爷”的內容在不少地方與右派言論均似出自一轍，雖然發表在前，看來宛如右派言論的“先聲”。這足以說明這篇相聲在政治傾向上的反動性，因此，原作者、改編者應該深刻自省，認真檢查，努力改正錯誤。

这是一支毒箭

李大千

讀了發表在“群众演唱”第十五輯上的独幕話劇“何处不相逢”以后，覺得劇本中存在一些問題，作为一个演員和文学爱好者，我願把自己的看法談一談。

我們不否認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官僚主义者，他們不按党的原則办事，漠視別人应有的權益，甚至听到別人的批評時還氣憤發火。我們有權利对这种思想加以揭露和批判，目的是为了糾正錯誤，改进工作。只要作者态度端正，写得击中要害，即便尖銳一些，也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何处不相逢”却給人一种另外的感覺，从全剧所表現的主題思想来看，是对我們今天現實生活的歪曲和誹謗。劇本主要的問題，是人物形象的不真实。作者不是把生活的真实加以集中、提煉，概括为艺术的真实，通过舞台形象給予觀眾一定的啓發和教育。相反的，我們却感到今天的国家人事制度、劳保条例不但不能維护工作人員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实上却成了負責干部为非做歹的护身符。而这些負責人事工作的领导干部，也都是思想簡單、官僚气十足的自私自利者。这从劇本中突出刻划的兩个人事科長——赵仁和孙本身上，可以充分看得出来。他們都是参加革命十几年的老干部，根据我們的常識判断，在国营工厂里負責人事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当然，作者也是把他們作为党员、作为典型人物来刻划的。可是像这样在党的長期教育下，有十几年革命鍛煉的老干部身上，我們感受到的是些什么呢？对待自己爱人生孩子是“安心休养，多吃母雞”，并強調“女同志生孩子，撫育子女是光荣的；生孩子就得憩产假，劳保条例

里有明文規定，任何人都得尊重”。這說明他們對女同志的甘苦和國家在政策上對女同志的照顧都很清楚。可是他們領導下的女同志生孩子了，又是怎樣對待呢？不管是勞動模範還是先進生產者，一律調雜工！理由是“任務重，沒有條件照顧女工的什麼困難，麻煩！”又說“調雜工也是為了照顧，以後可以多生多少孩子生多少孩子……”並說“這是領導決定，必須服從！”否則就成了“組織性、紀律性問題。”我們看看這付嘴臉，再想想他們領導下的工廠的人事工作，那該是一種多么可怕的情況呢！正如趙仁當自己的愛人被調為雜工時所講的：“你們人事科長有什麼權利下你的車，調你去做雜工？……提到原則上看，是違反干部政策的，是嚴重的錯誤！”值得注意的是：劇本中所表現的並不是個別人和個別現象，而是無獨有偶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向作者提出一個問題：這樣的表現是真實的嗎？

在我們國家的工廠里，從解放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和政府無微不至的关怀下，一切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是欣欣向榮地向着逐步滿足廣大職工的需要方面發展。在領導、管理方面，也是採取了說服、教育、批評與表揚相結合的作法，這與資本主義國家工廠里的強迫、專制、體罰等殘酷鎮壓的作法在本質上有天壤之別。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凡是下廠體驗過生活的藝術工作者都知道的。但是，在劇本中出現的身為黨員、老幹部的人事科長們，在工作上却是那麼簡單、粗暴、強迫命令！這就不能不使我們產生懷疑：作者這樣表現的目的是什麼？難道這能解釋為是他們的思想和作風問題嗎？

很顯然，劇本所給我們的陰暗感覺，說明了作者不是從“治病救人”的態度出發，而是別有用心的採取了巧妙的指指点點的手法說：“看看吧，今天工廠里人事科長們的形象就是這樣！別看都是參加革命十幾年的黨員、老幹部，他們的所做所為都是這

样！”因此，我認為这是一个含有大量毒素的剧本，它不仅污蔑了我們国家的人事制度、干部政策，而且有意的歪曲了党员、負責干部的形象，挑撥了党与工人阶级、领导与被领导之間的关系。它是向党的领导、向社会主义制度射出的一支毒箭！我們反对这种造謠污蔑、混淆黑白的作品，因为在揭露与批判的观点上說，它和我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創作有着原則性的分歧。

“何处不相逢”是一株毒草

吳 源

“何处不相逢”这个剧本刊載于“群众演唱”第十五輯，本年七月，曾由北京業余話劇队举行公演，作者为賈魯。

我們認为这是一株毒草，因为它严重地歪曲了現實生活的本質。首先，讓我們来看看这个剧本选择的題材与人物。作者說他是把生活中的个别現象加以夸张而写成此剧的。在現實生活中是否有这样的現象存在呢？事实是这样的：解放后經過民主改革，在各工厂中，党和政府对于女工怀孕时，在工資、休息、产假、飲食、喂奶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办法来照顧，根本不存在什么人事科長抽調产假期滿的女工下車的現象，更沒有那个工厂会把自己厂里的劳模或先进生产者輕率地調为杂工的。退一万步說，即使某个單位在处理女工問題时曾經有过偏差，也決沒有达到作者夸张那样的程度。如果作者是站在無产阶级的立場，那末在題材取舍之間必然会有一定的分寸。在作者筆下出現的兩個人事科長都是参加过张家口战役的老同志，而且必然还是老党员，可是在这个剧本里，就在同时同地，对于同样的调动工作的事件，他們居然会

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他們的嘴裡剛剛憤怒地說過：“這是誰給他的權利？”接着却又說：“我們完全有權利這樣作。”試問这样的人物在現實生活中那有一絲的影子？至于兩個身為勞模或先進生產者的女工竟然也變成了目無組織紀律的人物，有的還沒有和上級見面就認為“與他談也沒有用”，有的居然和上級大開其玩笑。結果是兩個人自作主張，決定在第二天上班時仍然去擋車，好像認為只有這樣才是對待兩位上級唯一的辦法。這樣的處理對於某些遇到上級的決定不符合自己個人利益的人將會給與一些什麼暗示呢，難道不是在鼓勵他們無原則地進行反抗麼？而且因為作者是把她們作為正面人物來處理的，可能引起的後果必然也更壞。

思佳同志在“關於‘何處不相逢’的排演”一文中，認為“對人對己的問題就是劇本的主題。”然而當我們仔細地研究了這個作品之後，我們覺得作品本身提供的主題已遠遠超過了思佳同志所指出的範圍。這與一般的“對人對己”的思想問題是迥然不同的，這已經是相當嚴重的品質問題。作為一個工廠中的勞保制度的執行者，一個具有十多年革命歷史的老幹部，自己分明也知道“懇產假在勞保條例中有明文規定，任何人都得尊重”，竟然一意孤行地作出違反勞保條例的事情來，並且還一再地說：“這是組織的決定”“組織上這樣做正是為了你！”這不就是說這位領導幹部是在“知法犯法”麼？而且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對待自己是一套，對待別人却是另外的一套，這難道还不是對於今天的現實生活作了嚴重的歪曲？

從作品所表現的傾向性來看，作者的創作態度顯然是極端錯誤的，對於敵人應該給予無情的打擊，而對同志則應採取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鬥爭以求達到團結的態度，這道理是盡人皆知的。然而這個劇本却無中生有地製造出一些人的矛盾來，並且對劇中人物處處加以冷嘲和熱罵，看不出一點與人為善的氣氛，並且

沒有提供任何發展的前景。讀者和觀眾最后虽然也會意識到調動工作的可能性是不復存在了，却有可能會認為這不過只是由於他們彼此之間的裙帶關係而已。試問，在群眾中將會產生怎樣惡劣的影響？從作品本身來看，作者一方面肆意刻劃了兩個蛻化墮落分子的形象，另一方面還想方設法盡其能事地來丑化這兩個人事科長，讓他們在舞台上丑態百出，甚至令人感到他們是神智不清。作者有時還使用“老光棍”“喪門神”“官僚主義”之類惡毒的字眼，對他們加以辱罵，並且讓他們在舞台上彼此對罵。他們對待勞模和先進生產者尙且如此冷酷無情，對於其他女工自然更不消說了。作者言外之意難道還不是昭然若揭了么？

由於這個劇本根本沒有真實性，因此故事情節的發展也是極端牽強的。不難看出，整個劇本里充滿了一連串並不真實或者不近人情的細節。例如錢秀梅已對趙仁提了李玉貞這個名字有十幾回，他竟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剛剛經他亲手調動工作的那位先進生產者，這是難於令人相信的，因為一個先進生產者的名字對於人事科長決不會是生疏的。又如李玉貞在緊要關頭忽然對人事科長開起玩笑來，也未免令人感到太荒唐。在這個劇本里，這類的例子是數見不鮮的，作者之所以這樣安排，可能是為了追求喜劇效果，但這些所謂喜劇效果却只是盡其能事地丑化了兩個根本不應該加以丑化的人物，使他們大出洋相。如果沒有這些並不真實或者不近人情的細節，自然就出不成洋相了。很明顯，作者所追求的喜劇效果是為丑化人物形象服務的，而不是為了達到善意批評的目的。

有人說：“這篇作品怎麼會是毒草呢？它沒有反對社會主義呀！人事科長有了缺點還是可以批評的呀！”可惜這些好心的先生只看到了問題的一方面，沒有看到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我們說某些傳統戲曲節目是毒草，難道其中也有反對社會主義的字樣